

甲午百年祭

多元視野下的中日战争



杨念群 主编

知识出版社

致 词

变革的时代需要繁荣的文化及其阐释空间的广阔。适逢摊头文学鼓荡俗世尘界、学术菁华之士困守书斋一隅之际，人们记忆中的蕴涵悲苦沧桑的历程和充满悲怆感的史迹，本应通过缜密的逻辑与思辨的智慧，用艰苦平实的学术工作重新加以磨砺钻研，可是如今文化的力量却似乎只能通过调侃与自嘲、侠义与煽情、偶像设计与偶像破坏的程序去消解历史，把人们赤裸裸地抛置到一个共时的平面中，仿佛人人都可脱离历史之流的濯洗而变成“俗人”。

当历史的时针在一百年之后将再次指向“甲午”这一时刻，国人仍会感觉到一阵阵的灼痛，而这种灼痛感在一百年前的那些不循旧例登高一呼的儒生们身上尤觉强烈。就在这一年，东洋岛国日本把他们的“文化师傅”在心理上的所有自尊自信全部剥落干净，中国就此更深地进入了一个大碰撞的变革时代，无论从何种意义言，“甲午”将永远喻示着一个不可忘却的心灵故事。“兴亡之事”与“危机意识”的复述本是千古文事，如我等商界中人倘能托旧事以述怀，也不妨一发思古之幽情，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想借此契机呼吁中国未来的文化格局应落基于更为坚实的历史继承感之上。

维系学术一脉需要多种因素的配合谐进，而赞助学术则更需卓越的通识眼光，就我的理解，所谓通识就是应在世俗文化潮涌泛滥之际，企业在与高品位文化的交互渗透中越升自身。因此，“甲午”的复述与再诠释于此意义上就不仅仅是又一次痛彻的心灵感悟与激励，也不仅仅是对一次纯粹历史事件的纪念，而更是一项企业与高品位文化接轨的实验，于是有此动议，是所望焉！

深圳金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龚俊龙

序

戴 逸

今年适逢甲午战争百年祭，作为一次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一百年前发生的甲午战争具有与以往历次的近代冲突迥然不同的历史特性和内涵。首先，甲午战争双方交战的对象出现了变化。中国自从被西方文明撞破了封闭已久的国门之后，一直视中西角逐对抗为亘古未有之奇变。一般士大夫官僚的基本判断是以文明源流的异同作为相互沟通与抗衡的标尺的，也就是说，在传统儒生的头脑中，西洋人本属“异族夷类”，是在华夏文化的辐射圈之外的“蛮夷小邦”，所以双方交战竞胜可以说是两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对抗与争锋，即使中国在与西方诸国的历次交战中屡屡受挫，在文化心理的调适方面也能保持平衡状态。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却彻底摧毁了这一心理平衡，因为中国面对的战争对手恰恰是被一些中国士大夫认为是同文同种的日本国。按中国士大夫的原有观念划分，日本应属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文明圈中的成员，并且自古久沐儒家文化的恩泽，与所谓“西夷”当然有别，中日交战无异于是同室操戈、兄弟相争。更为严重的是，处于同一文化圈内的日本徒弟借助的恰是“西夷”的技艺，并以之击败了其自古尊崇的天朝中国，这在中国朝野引起的心理震动用创深痛巨加以描述实不为过。当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曾经描述过当时士大夫们的普遍心态，他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慢侮，侵削若刳羊缚豕，坐

受剥削，耻即甚矣，理亦难解。”也正是在前所未有的困惑侵袭下，甲午战后由知识群体所发动的变革才有了比以往更为深刻和明确的目的和要求。对日本强盛的疑惑与探究终于在战后诱发了波澜壮阔的变法运动。

其次，中日甲午战争作为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其后所引起的全方位变动也是历次战争之后所没有的。“甲午”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代名词，而是近代变革进一步深化的标志或象征。甲午战后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变迁逐步加速，诸如军事布局的重组，社会阶层的频繁分化与流动，新兴知识群体的崛起与传统政治秩序的日益衰败等等都是以这场战争为界分标志的。甲午战后，中国人正是在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况下自省战败的原因的，自省的结果使战后的变革方式和内容均较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有些人对旧有政治体制的运转效率和功能开始提出质疑，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经过洋务运动的多年引进，在军事力量的对外总体抗衡能力上应该有了很大改善，可是为什么在蕞尔日本的攻击下却一触即溃了呢？失败的原因只能在器技之道输入之外的深层原因中寻找。因此，政治变革主张的勃然兴起，就变成了一种历史演进的自然逻辑和内在要求，而以甲午战争为触媒的政治改革又作为中国社会发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变化起始点载入了史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甲午”一役的内涵大大超越了一般战争中所具有的蕴意。前几年曾经有一些学者把中国近代变迁描述为由外层至内层递次演进的三大步骤，即由器技中经制度改良最终达至文化心理的变革。如果承认这种观点尚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恰恰是以“甲午”为界，制度与文化这两大步骤的变革均发生于中日战争之后。这两次变革也正是战前洋务运动策略的扬弃与深化，它昭示着近代中国变化频率的不断加快。所以我们今天纪念甲午之役，就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这场战争本身前因后果及进程的分析上，而是应尽量扩大研究视野，把甲午之变

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洞察审视。未来研究急待揭示的是，“甲午”一辞所蕴含的不仅是中日在战争中的武器与战略战术的较量，而且也是制度与文化对近代变革适应能力的较量。我想这也可能正是论文集副标题取“多元”之意的所在。

这本论文集的作者包括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研究人员，其中既有长年研究甲午战争史且成绩斐然的老专家，又有崭露头角的史学新锐，其中有些作者还留学过日本，总体上说是颇有一定代表性的。从文章的内容来看涵盖面也比较广阔，涉及甲午战争前后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诸方面交涉来往的各类问题及其相关领域。在研究范围和题材风格的开掘上也体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已有论文集的编纂方针相比，这本论文集更多地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传统的与现代的、史学的与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同乃至相互对立的看法，都在论文集有所反映，并相应地占有一席之地。比如一些反复争论过的诸如李鸿章的派系归属及甲午战争中军事战略的布署等问题，文集中重新进行了讨论与辨析，并力求阐释出新意。一些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如中日间谍战和甲午战争中的文学现象，中日士阶层对西学冲击反应方式的比较等等也纳入了作者的视野，研究范围的扩大和题材选择的新颖无疑有助于在新的基点上深化甲午战争的研究。一些年轻学者还试图运用知识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等分析甲午前后知识群体变迁与政府对西方“综合反应能力”的变化。这些研究虽然带有一定的尝试性，有些方法的运用尚待完善，具体观点的阐述也有待验证和商榷，但论文集编纂主旨体现出的多元竞进的探索精神还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对于明确甲午战争史研究应从何处突破也是不无启示和帮助的。

目 录

序

再论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	戚其章 (1)
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	李文海、康沛竹 (18)
翁同龢与甲午战争·····	龚书铎 (39)
甲午中日战争与晚清财政大变局·····	梁义群 (52)
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	朱 英 (77)
论甲午战争前十年间清朝的国防战略失误 ——兼论北洋海军停止发展的原因·····	潘向明 (98)
从《字林西报》看英商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反应 ·····	余绳武 (134)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日本观的转变 ·····	王晓秋 (142)
甲午战争前中日士阶层对近代教育的回应 ·····	贺跃夫 (156)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知识群体类型的演变 ——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	杨念群 (176)
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分化 ·····	马 勇 (200)
从近代中国的“综合反应能力”看甲午战争 以后现代化的挫折 ·····	萧功秦 (230)
论甲午诗的思想特色 ·····	孙燕京 (255)
一个中日文化关系史上被忽视了的细节 ——辜鸿铭赴日讲学述论 ·····	黄兴涛 (270)
马建忠与朝鲜问题 ·····	谈群玉 (292)

再论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

戚其章

10年前,当甲午战争90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篇题目《正确评价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的文章^①,对否认李鸿章为主和派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后,又将自己的这一看法写进了《甲午战争史》一书。台湾学者吴圳义先生在一篇长达两万余字的书评中对拙作提出了异议。^②可惜吴先生未能运用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主要是认为蒋廷黻先生和郭廷以先生与笔者有“不太相同的看法”。因此,我感到还有再进一步申明个人观点的必要。

一、战前在对日政策上的态度

李鸿章确实是一位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在甲午战争中集军事、外交于一身,表现是多方面的。本文仍按甲午战争的进程分别论述,以期把握住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基本倾向和表现。

甲午战争爆发以前,当日本大举派兵进入朝鲜,并采取步步紧逼政策时,李鸿章对其侵略野心是有一定认识的。当然,李鸿

* 此文原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四期。

① 《光明日报》1984年6月13日《史学》。

② 吴圳义:《评〈甲午战争史〉》,《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十),台湾国史馆编印,第54页。

章的这一认识是有限度的。他断定日本“以重兵挟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然仅此而已。他尚未料到日本会真正借朝鲜问题发动侵略战争，更完全没有想到日本会趁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才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驳辨勿怖。”^①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同日本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中，才会愈来愈陷入被动的境地。

应该说，李鸿章在中日交涉中起初所持的原则立场，是正确的。当时，鉴于朝鲜政府希望中国“撤兵，解倭急”，而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又有“华撤兵，伊即同撤”之语，于是他一面嘱清军主将叶志超“整理归装”，一面指示袁世凯与大鸟“约定彼此同时撤兵”。^②此其一。其后，当日本抛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时，李鸿章又支持驻日公使汪凤藻的关于“中倭皆不干预韩政，惟劝韩自行清厘”^③的意见。此其二。对此，是应该加以肯定的。所以，我曾说过：“李鸿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见得全错，是无可厚非的。”^④吴圳义先生说我不象郭廷以先生那样“并未十分苛责李鸿章”，并不符合事实。

如果对史实进行深入分析的话，便不难看出，李鸿章尽管在对日交涉中坚持了原则立场，却未能洞察日本的奸谋，进而及早采取相应的策略。其实，日本挑起战端的决心早就定了，是决不会从朝鲜撤军的。用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话说，就是“自该处空手回国，不仅极不体面，且非得策”。^⑤日本之所以还要同中国讨论双方共同撤军问题，不过是虚与委蛇，赢得时间以寻找挑

①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49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15—16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0页。

④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32页。

⑤ 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第88页。

起战端的机会而已。以后，日本政府在抛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的同时，又密示大鸟圭介：“作为延迟我军撤退之理由，阁下可用最公开而表面上的方法，即派遣公使馆馆员至暴动地方进行实地调查。而上述调查，务令其缓慢进行，并使其调查报告书故含适与和平状态相反的情况。是所至盼！”并明告：“无论使用任何借口以使我军留驻于京城，最为必要。”^①真可谓机关算尽！显而易见，日本的目的是，既要日军死赖在朝鲜不撤，又要想方设法拖住赴朝清军，以制造对中国直接开战的借口。李鸿章对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缺乏正确的估计，一厢情愿地希望日本撤兵，而这种决无结果的谈判只能贻误时机，最后落入日本所设的圈套。不能不承认这是李鸿章的一个失误。

曾经有人说，李鸿章不是“纯粹的主和派”。我在十年前所写的那篇文章里提出了异议。现在看来，这个提法倒是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可以说李鸿章不是“纯粹的主和派”。那么，战争爆发前的李鸿章究竟应该归于哪一派？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显然，将李鸿章划为主战派是不行的。当时有不少官员提出，应急治军旅，对日示以必战。如太仆寺卿岑春煊称：“为今之计，与其后日添防，老师餽饷，靡有穷期，何若今日临以大兵，示以必战？”^②礼部右侍郎志锐亦称：“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③翰林院修撰张謇甚至认为：“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④这些主战言论未必完全可行，但要求在军事上争取主动还是正确的。可惜李鸿章皆与之意见相左。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552号。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4卷，第34页。

③ 同上，第38页。

④ 《张謇致翁同龢密函》。

光绪皇帝对朝鲜形势极为忧虑，多次谕令李鸿章加强战备。

6月25日谕：“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以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急迫。……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着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①

7月1日谕：“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胁迫，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业已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勋劳，著即详细筹画，迅速复奏，以慰廑系。”^②

7月16日谕：“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懷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③

对于6月25日和7月1日两次上谕，李鸿章仍未迅速行动，积极进行部署。直到7月16日的严旨下来，他才开始增派援军赴朝，则已事事落日人后著了。可见，确实不能把李鸿章划为主战派。

那么，称李鸿章为主和派行不行？好象也不行。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主和派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默察朝鲜形势，认为实行战略退却是为上策。7月10日，他向直隶提督叶志超建议，速请“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并致电李鸿章称：“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5页。

② 同上，第29—30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4卷，第35—36页。

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①

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若此建议能被采纳，则不仅可改变中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处境，而且亦将在政治及外交方面赢得主动的地位。对于日本的侵略计划来说，必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李鸿章却未能采纳此策，错过了这次实行战略退却的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后来张謇曾批评李鸿章“败和”，^②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此时的李鸿章自然算不上主和派。

李鸿章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不认为日本会真的发动战争。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因为“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③直到日本发动战争的前几天，已经有数日内日本即将开战之传闻。他仍然认为：“开仗之说似是谣传。”并指示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诘。切记勿忘！汝勿性急。”^④

李鸿章之所以相信日本不会开战，主要是因为他对俄国的插手干涉抱有太大的幻想。最初，当李鸿章请俄国公使喀西尼转电俄国政府进行干涉时，喀西尼满口答应，并称：“日内即致电，想外部亦同此意。”李鸿章信以为真，即电总理衙门：“素稔倭忌英不若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⑤稍后，喀西尼又派参赞巴福

① 《中日战争》（六），第8页。

② 黄浚：《花随人圣筵忆》，第448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10页。

④ 同上，第24、25页。

⑤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19页。

禄面告李鸿章：“俄皇已电谕驻倭任使转致倭廷，勒令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会议善后办法。如倭不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①言之凿凿，更使李鸿章信之不疑。其实，干涉云云，仅是喀西尼的一己之见，并未得到俄国政府的批准。可是，李鸿章一直不放弃对俄国干涉的幻想。7月18日，他致电驻俄国公使许景澄称：“初盼议成，倭忌俄，暗嘱英居间，俄益忌英，并未议妥。望赴外部声明，託俄系国家意，或更出力。”到7月23日，即丰岛海战的前两天，竟然还电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②可见，他对俄国干涉的幻想是始终不悟的。

李鸿章一面指望俄国的干涉，一面又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进行秘密接触。他派伍廷芳和罗丰禄密访荒川，要求荒川将李鸿章希望和解之意转告日本政府。7月22日，朝鲜形势已相当紧急，他又让人转告荒川，他已决定派罗丰禄作为他的秘密特使前往东京，与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商谈事项。表示衷心希望能够和解，并安排好就朝鲜问题开始商谈。还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之前，驻朝日军不采取敌对行动。24日，陆奥宗光复电表示“不特别反对罗丰禄来日本”。^③然而，罗丰禄正准备东渡之际，丰岛海面日舰的炮声却中断了中日之间的这场秘密交涉。难道罗丰禄赴日就有消弭战端之法吗？原来其法不是别的，就是以银赂日。吴汝纶《复陈右铭书》称：“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并特别指出：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4页。

② 《东行三录》，第138、144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607、608号。

“以上所言，皆某所亲见。”^①是时吴汝纶正在李鸿章幕中，而且在对日方针上观点一致，他的话是不会假的。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在对日交涉中尽管有某些可肯定之外，但其基本倾向却是想采取类似绥靖主义手段来消弭战端，这当然是不足取的。因此，战前的李鸿章既不是主战派，也算不上真正的主和派，姑且借用绥靖主义之语义，称之为绥靖派，似乎较为恰当。

二、战争中对和战问题的基本倾向

日本海军既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军舰，挑起了战争，李鸿章的态度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复电总理衙门称：“倭先开战，自应布告各国，俾众皆知衅非自我开。似宜将此案先后详细情节据实声叙。”并提出：“汪使应撤回，倭驻京使及各口领事应谕令自去。”^②就是说，既要声叙日本挑起战端的罪行，又应中断中日两国之外交关系。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明与日本决裂的姿态。

但是，应该看到，李鸿章之所以有此转变，与当时西方列强的动向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国际形势对中国是绝对有利的。

首先，对英国倡导的“五强联合调停”计划怀有希望。所谓“五强”，是指英、俄、法、德、美五国。这个计划是英国政府在7月上旬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俄国单独插手。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承认：“此举实为防御俄国单独干涉之手段。”^③但是，俄、法、德、美四国各有自己的打算，对联合调停的态度并不积极，实际上此计划已经流产。而在日本挑起丰岛海战的当天，英国公使

① 黄浚：《花随人圣龕摭忆》，第417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34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658号。

欧格纳又旧话重提，并且十分肯定：“前劝日本退兵和商一节，日本非但不听，且说话更紧，我政府甚为不悦，已电日本。”又称：“现在英、俄之外，又约德、法、意三国同办此事，合力逼着日本讲理，谅亦不敢不从。此时说话，总在日本一边用力。我今日即发电我政府，加力催着日本。并往西山请德国钦差回京。令各电各政府同向日本政府说去。此是好机会，难得五国同心帮助贵国。”^①对于欧格纳的话，无论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也好，李鸿章也好，都对列强联合调停产生了新的希望。

其次，英国在倡导列强联合调停的同时，又提出了中日在朝鲜划区占领的建议，也使清政府感到和解有望。这个建议也是早在战争爆发前就提出来了。其主要内容是：“中日两国共同占领朝鲜，双方都撤出汉城和仁川，日本占据汉城以南地区，中国占领以北地区。”^②其实，这个建议已被俄、日两国所拒绝，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英国政府也就放弃了这个方案。然而，不仅李鸿章还蒙在鼓里，而且连俄、英两国公使也莫知底蕴。7月26日，即丰岛海战爆发的第二天，李鸿章仍兴致勃勃地同喀西尼商讨实施划区占领方案的具本办法。喀西尼问：“中日应各退何处？须离汉城稍远”。李鸿章胸有成竹地答称：“宜令倭兵退釜山，华兵退平壤，各离汉城五百里。”喀西尼竟表示赞成：“此最公允”。^③就在同一天，欧格纳也告诉总理衙门：“我今日尚与各国大臣商量，拟请华兵退至平壤，日兵退至釜山。日本如不听话，各国均不能答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5卷，第23页。

②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 4, Sino-Japanese War, 1894, p. 60.*

③ 《东行三录》，第146页。

应。”^①所有这些，都使李鸿章等人产生了乐观的情绪。

复次，日本海军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事件的发生，更使李鸿章坚信英国必不肯善罢甘休。当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后，李鸿章认为：“至高升系怡和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倭敢无故击毁，英国必不答应。”^②在他看来，中国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弭止战端，此其时矣。

正由于此，才促使李鸿章在对日方针上发生了转换。他开始想借外交上的优势地位，采取以战促和的策略。他对北路赴援朝鲜的淮军寄予期望，并抱有很大的信心。他认为，这些部队皆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凡其力所能及者，当可无误机宜”。并提出：“如各军均逼汉城，届时须与各国交涉，再随时请派大员前往督率联络，期有实济。”^③这时，驻英公使龚照瑗来电称：“现倭焰盛，望中获一胜仗，日后公议，中益多。”^④与李鸿章的想法正不谋而合。他相信清军会进逼汉城，那时中国转居于主动的地位，再与列强交涉，以促成和议。无论如何，他的以战促和的方针含有积极的因素，是不可一笔抹煞的。

李鸿章采取以战促和的方针，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的这个方针又是建立在列强干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尽管日本已经挑起了战争，他同喀西尼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他曾派盛宣怀与巴福禄密谈。在交谈中，巴福禄表示：“俄国亦不能坐视日本如此之强横。”盛宣怀立即随声附和：“吾想贵国此时亦要发兵矣。倘贵国发兵，大约总在元山横俄、韩边界相近之处。”并转述李鸿章的意见：“吾国并中堂之意，均欲与贵国合而为一，将日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5卷，第25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5卷，第27页。

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6卷，第3页。

④ 《东行三录》，第150页。

兵逐出。惟贵国须用兵费甚巨，亦断不能不重为酬劳。”^① 靠贿赂强国出兵干涉的办法来实现以战促和的方针，不仅毫不足取，也有些异想天开了。

事实上，李鸿章所设计的以战促和方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列强干涉的基础上，犹如缘木而求鱼，会有什么结果？列强调停云云，也若镜花水月，渺无迹痕可寻。高升号被沉事件倒是触动了英国当权者的神经，但冷静下来以后，权衡利害，英国政府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而认为中国应该赔偿高升号沉没的损失。其理由是：“由于高升号是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后从事向作战地点运送中国军队的工作，而且高升号的英国船长已被剥夺了指挥权，实际上对该船的控制权已落入船上的中国军官之手。所以，女王陛下的政府曾被劝告将赔偿英国国民生命的财产损失的责任归于中国。金伯利大臣准备按照贵公司的要求，支持贵公司向中国政府提出合理要求。”^② 这是英国外交部给高升号船主信中的话。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是以防俄为大局，视日本为共同防俄的未来盟友，不会因一艘商船被沉而改变此一方针的。这样一来，对李鸿章来说，外交上由似乎有利转为不利，军事上又步步受挫，其以战促和的计划自然要落空了。

李鸿章指望列强干涉虽一直未见成功，但真正的议和却是由他开其端的。8月13日，李鸿章曾向总理衙门报告与巴福禄晤谈情况，称：“看来俄似有动兵逐俄之意。该使谓，如何办法，该国尚未明谕，而大要必不出此。”^③ 慈禧太后也有联俄的幻想，此电正投合她的心意，不过在当时主战舆论高涨的情况下，不便于明确表示罢了。尽管如此，此电却成为她以后探询和议的张本。9月

①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07—108页。

② *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 1894—1895*, Vol. 5, p. 54.

③ 《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880页。

下旬，慈禧以清军陆海决战失利，提出派翁同龢到天津，探询李鸿章能否设法请求俄国调停。她嘴上说：“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事实上，她已打定主意要议和了。李鸿章既知慈禧出面主和，正合乎自己的心意，便告诉翁同龢，“俄廷深忌倭占朝鲜”，并保证说：“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①从此时起，他便在主和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了。

不久，慈禧决定重新起用恭亲王奕訢，作为推行求和方针的一个关键步骤。从此，她可以内依奕訢，外靠李鸿章，以推行其求和方针。与此同时，慈禧的亲信荣禄与吉林将军长顺策划于幕后，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取得了一点共识：“惟审量彼己之势，默揣当今之局，和则犯千古之不韪，战则尤兵将之不可恃。此中应如何安危定倾，非出自宸断，将无有以轻言进者。”^②就是说，要推行求和方针，必须让光绪承担和议的责任。慈禧果然施展手段，迫使光绪降心相从，这便扫除了求和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反对和议的帝党终于败下阵去。李鸿章既是主和的始作俑者，他在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阵营中，其作用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于是，清政府便一面公开请英、法、德、俄、美五国出面干涉，一面漏夜商议一件“密事”。所谓“密事”，就是如何派朝廷大臣直接与日本议和，由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亲至天津与李鸿章商谈如何开议，以救燃眉之急。张荫桓带去了奕訢致李鸿章的密函，内称：“此时应如何设法以期了结之处，阁下受恩深重，义无旁贷。且系奉旨归我等数人办理，必可合力维持。”^③同时，李鸿章又接到密寄，内谕：“须亟筹救急之方，现各国虽允出为调停，深恐远不济急。”这就将派人直接赴日议和之事合盘托

① 《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八月二十八日、九月初六日。

② 《近代史资料》1962年等3期。

③ 《李鸿章未刊稿》（抄本）。